



四马路菜场



路菜场楼上指挥乐团排练  
一九五四年,黄贻钧在四马路菜场楼上指挥乐团排练



阿甫夏洛穆夫(左)

# 四马路菜场的喧嚣与风流

◆ 读史老张

## 从四马路菜场拉开序幕

1843年上海开埠后,英租界内没有固定菜市场,商贩或农民将菜运入市区后,或随地设摊,或沿街叫卖,到处都是“马路菜场”,商贩辛苦,卫生堪忧,市民叫苦不迭。约1890年,有一巨商在南京路(今南京东路)五福弄,用芦席搭棚,建成了一个简陋菜场。至此,公共租界内有了第一个菜场。

1897年起,公共租界工部局拟扩建菜场,先在劳合路(今六合路)沿街建立临时菜场,后又在九江路广西路口建成新菜场。因新菜场外墙和屋顶以铁皮构成,被称作“铁房子菜场”。上世纪二十年代,工部局拟将“铁房子菜场”从九江路迁出。1929年,于福州路(即四马路)觅得新址,决定兴建一个大型的室内菜场。

这一决定,引起了不小争议,华人商界尤其不满。1929年4月,四马路商界联合会致函工部局市政处称:“……租界内市面最繁盛者,首推南京路及四马路。若一旦将该处市房拆建菜场,则该段之市面势必随之冷败。且查各处菜场之设,其地点皆属市面较为冷落之处,未有以市面最兴盛而热闹之地段建筑菜场者也。”因此,商会建议,新菜场应“尽可另择相当地点建筑之”。

对于华人商界的的不满,工部局并不理会,复函称:“查该处改建小菜场,系特别新式,二楼三楼统做菜场,楼下仍可开设商店,对于市面及各商店营业,并不受任何影响云。”这个复函,既敷衍又傲慢。

胳膊终究扭不过大腿。1930年,在一片质疑声中,四马路菜场拔地而起。菜场为四层钢筋混凝土大厦,结构稳固、气势恢宏,一至三楼为商铺,四楼为工部局办公机关。显然,这既是一家菜场,也是一座壮观的商办大楼。

菜场开业后,并未按承诺只在二三楼做菜场,其底楼商铺不仅卖菜,还供应海鲜水产品。每到天亮,商贩聚集菜场,群起吆喝,市面喧嚣,生意兴隆。因品种丰富,琳琅满目,菜场颇受各界欢迎,顾客近悦远来。这些顾客中,既有华人,也有洋人;既有底层市民,也有洋场阔佬;既有悠闲少妇,也有帮佣娘姨……当年有一首打油诗,这样描写到菜场买菜阔太太:“包车拖到小菜场,奶奶架子搭松香。若问今朝买点啥?三个铜板一条腌臭鲞。”这首诗,将阔太太的摆阔与炫耀、精明与小气,刻画得淋漓尽致。

因为四马路菜场人潮汹涌、鱼龙混杂,地下党在此活动频繁,似在情理之中。《千里江山图》的序幕,从四马路菜场拉开,确实是作者的点睛之笔。

孙甘露长篇小说《千里江山图》的故事情节,就是从四马路菜场楼上展开的:一九三三年农历新年前后的某日,接到开会通知的多名地下党员陆续来到菜场楼上。忽然,传来两声枪响,接着啾啾一声,有人从四楼跳下。大家刚想撤退,就被租界巡捕和侦缉队便衣堵在了房门口……

四马路菜场(又名福州路菜场),位于福州路浙江路口(福州路571号),由原公共租界当局建成于1930年,为当年上海最先进的菜场之一。

## 2

### 他辨出那是《未完成交响曲》

作为商办大楼,四马路菜场还是工部局机关办公的场所。特别有意思的是,在菜场四楼,设有工部局乐团驻地。

工部局乐团(今上海交响乐团前身)成立于1879年,原名上海公共乐队。1922年,改名为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。乐团原先常驻于南京路上的市政厅,后来市政厅被拆,四马路菜场建成,乐团就常驻于菜场楼上。

工部局乐团常任指挥,是来自意大利的钢琴家梅百器(Mario Paci, 1878—1946年)。他自1919年起执棒乐团,到1942年辞职,在乐团长达23年。乐团驻四马路菜场四楼时期,正处于“梅百器时代”。据梅百器的女儿晚年回忆,“父亲在乐队的办公室是一间很大的屋子。里面有他自己的斯坦威钢琴,墙上有很多艺术家和朋友的照片。每一个桌子上都有很多乐谱”。乐团首席兼副指挥是意大利小提琴家富华(Arrigo Foa),他于1921年到队任职,1942年接任乐团常任指挥,直到1952年离开。

据《千里江山图》描述,以医生职业为掩护的地下党员秦传安,“平时喜欢音乐,在自己的诊所里也放了一台唱机。如果乐团在市政厅或者兰心大戏院有音乐会,他通常会提前来看排练”。那天,他乘电梯上到菜场三楼,“电梯门一开就听见舒伯特,他辨出那是《未完成交响曲》……”

其实,舒伯特的《未完成交响曲》,是工部局乐队的保留曲目。早在1923年4月,日本乐评家田边尚雄初到上海,就在市政厅听过乐队的演奏。那时,日本还没有完整的交响乐队。田边尚雄称,作为“远东第一”的工部局乐队,木管部分很突出,“特别是第一首舒伯特的《未完成交响曲》第二乐章,木管部分的娴熟技艺使得整个乐章格外醒目,听来十分悦耳……”

## 3

### 交响乐团驻守办公排练



梅百器

工部局乐团初创时,成员主要是外国人,乐手来自意大利、奥地利、德国和菲律宾等地,后来也有流亡的俄国人加入。1927年以后,乐团有了中国人的身影,谭抒真、张贞黻、王人艺、陈又新和刘伟佐等,都先后以实习生身份加入过乐团。曾任乐团实习生的张贞黻,回忆过他于1935年第一次来到乐团时的情景:

上午九时,携着大提琴走上了上海四马路(今福州路)小菜场的四楼,通过一条长廊,推开二重双扉的一个大厅,这便是上海工部局乐队的练习室。这时大部分乐师都闲散着,有的在不着意地玩弄自己的琴,有的燃起烟卷在微笑,有的在散步,更有的在阅读报纸和信件……我是考入这乐队后第一次来到这里,所以很怯生生地去拣了一个角落对着他们坐下。

1938年,谭抒真、黄贻钧、陈又新、徐伟麟等首次以正式乐师身份加盟工部局乐团。在梅百器指导下,乐团与中国近代音乐家萧友梅、黄自、马思聪、卫仲乐和吴乐懿等也有过合作。

另外,著名音乐家聂耳、冼星海与乐团也有过交集。1934年初,聂耳报考上海国立音专小提琴科,但未被录取。主考人就是在音专兼任小提琴科主任的富华。对于这次考试,聂耳在2月24日日记里仅写了四个字:“音专失败。”

1935年冬,已从巴黎国立音乐学院作曲班毕业的冼星海,在朋友介绍下来到了四马路菜场楼上。起初,梅百器对他很器重,让他指挥乐团排练贝多芬的《第八交响曲》。但是,后来却没有让他参加正式演出。究其原因,可能与富华的排挤有关。据冼星海回忆:“当时,我与阿沙摩罗夫(即俄裔犹太音乐家阿隆·阿甫夏洛穆夫——引者注)和一两位朋友同去,阿氏是交响乐作家,上海最有名的作曲家,亲眼看见我指挥《第八交响曲》,他说我指挥得好,可是Paci(梅百器)就拒绝了我,还有Foa(富华)在下面对队员们宣传反对我……”最终,冼星海愤而离开了四马路菜场。

1942年日军占领公共租界,梅百器辞职,工部局乐团易名爱乐乐团。抗战胜利后,改称上海市人民政府交响乐团。1949年上海解放,乐团取名为上海市人民政府交响乐团,后又改称上海乐团、上海交响乐团。

这一时期,交响乐团始终驻守四马路菜场办公、排练。菜场环境的喧嚣、烦扰,曾令指挥家黄贻钧颇感头痛:“那里声音十分嘈杂,路上的喇叭声、锣鼓声、喧叫声尤为突出。一到夏天,菜场的鱼腥味更是臭气熏天……”

1956年,在陈毅市长关怀下,上海交响乐团迁入延安中路陕西路口办公(后迁入湖南路),终于离开了驻守二十多年的四马路菜场。

## 4

### 菜场楼上有个图书馆

《千里江山图》中,还写到过在四马路菜场楼上有一个图书馆,地下党员田非正是这家图书馆的职员。正是他,发现了三、四楼间的一个夹层,“连图书管理员自己也不会去”,可被用作地下党开会的密室。

在四马路菜场四楼,过去确曾有过一家工部局图书馆。不过,那是1941年才正式迁入的。那么,在上世纪三十年代,菜场楼上是否也设过图书馆?我没查到史料。当然,不排除工部局机关设有图书室和书库之类。

值得一提的是,工部局图书馆历任主任都是外国人。最后一任主任,就是上文冼星海提到的阿隆·阿甫夏洛穆夫(Aaron Avshalomov, 1894—1965年)。1933年至1943年,阿氏在工部局图书馆工作。他是俄裔作曲家,也是中国现代音乐的开拓者,创作过不少中国题材的音乐作品,如《北平胡同印象记》《G大调钢琴协奏曲》《琴心波光》《古刹惊梦》《杨贵妃之死》等。他的作品,前期多由梅百器指挥排练演出,两人配合默契。另外,著名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,也是由阿氏配器的。

1941年,工部局图书馆几经搬迁,终于迁至四马路菜场楼上。阿氏作为工部局图书馆的最后一任主任,既对现代图书分类非常在行,又能经常在此指挥乐队排练,这让定居上海的他如鱼得水,佳作频出。其中,尤以他在1945年创作的六幕歌舞剧《孟姜女》,影响巨大。1946年,应宋庆龄邀请,《孟姜女》为中国福利会募捐演出,成为当时轰动上海的大新闻。

1942年7月,日军进攻租界。工部局图书馆被日伪当局接收,改为第一区公署图书馆,后又改称上海特别市市立图书馆。抗战胜利后,该馆由国民政府接管,改称上海市立图书馆主馆,另在南市文庙和虹口塘沽路等处设分馆。1948年1月,市立图书馆在四马路菜场曾举办过“中国历代图书版刻展览会”,陈列古籍精品200余种,在当年藏书界颇有影响。

不过,图书馆设在菜场楼上,既闻音乐声又听叫卖声,读书环境糟糕,自然屡遭诟病。在图书馆门口,那块写着“Silence”(安静)的英文木牌,反倒像是一个讽刺广告。有人曾感叹道:“身处福州路菜场的楼上,烟尘弥漫,市尘喧嚣……哪能给市民安心读书呢?”

1949年7月,市立图书馆由人民政府接管,改称上海人民图书馆。1957年,人民图书馆告别四马路菜场,迁往文化广场大楼,后并入上海图书馆。从此,四马路菜场真正姓“菜”,成为本市著名的大型室内菜场之一。直到进入新时期,四马路菜场才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。

在漫长的日子里,四马路菜场既满足了上海人的物质需求,也为之推开了一扇精神之窗,功绩卓著,令人难忘。